

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

何玉红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蜀道经济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区。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战争不断。其中蜀道经济带成为边防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队长期驻守防御。战争以及供给军队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南宋;蜀道;衰落;物资供应;战争破坏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7)03-0053-06

蜀道经济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区。梁中效先生在《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1]一文中指出:“宋代成都府路、梓州路的成都平原,利州路的汉中盆地,永兴军路、秦凤路的关中平原,是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畅通的蜀道将它们连接起来,形成了经济上联系密切优势互补的蜀道经济带。”宋代“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强大的经济辐射力,促进了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蜀道城市带的繁荣发达;蜀道城市带的崛起,是汉唐时期不可想象的,也是元明清时期无法企及的”。梁先生对宋代蜀道经济带的自然环境、城市地域结构、市场运作等作了高屋建瓴的论述,读后很受启发。但笔者以为,梁先生所述宋代蜀道经济带的繁盛实际上只是限于北宋时的情况。就南宋的历史看,蜀道经济带呈现出衰败的景象。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其中蜀道沿线成为边防前沿,军队长期驻守防御。战争以及供给驻军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蜀道经济带各区域在北宋与南宋的比较中探讨蜀道经济带的衰落情况,并观察在此过程中战争与物资供应的影响作用,以就教于方家。

自北宋以来,这里的农业就很发达。但从资料记载看,时至南宋,汉中盆地地处宋金、宋蒙对峙的边界,由于军队粮饷供应的影响和战争破坏,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衰败景象。

绍兴初年,战争频繁,大量军队开始集结到川陕交界地带。绍兴五年(1135),知普州喻汝砺上言:“汉中之地,峻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广……今则城池丘墟,屯戍荒圯。”^[2]卷94,绍兴五年十月从南宋初年开始,汉中的颓相就已经显现。秦岭是南宋边疆防御的一道天然屏障,一旦金人翻越秦岭就可进入汉中。为加强防御,人为设置险要在所难免。“不但阻绝要害,且置阱于腹中,歼侵轶之骑,敌觇知之不敢南盼。”^[3]卷14,故端明殿学士王公行状在平地设置险要,利于防御,却有碍于生产。时人杜范《汉中行》一诗形象的反映出战争对汉中的破坏,“思昔汉中殆,椒扰自荒渺。驱侵警边陲,烟氛暗华国。官守既蒙尘,宫庙入异域”^[4]卷2,汉中行。战后的汉中,已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征收钱粮供给军队,对汉中民生影响也大。“梁益之地,久苦重征,自承平时固然。南渡之初,一切取办,关外之众,仰之而给”,供军数量大,时间久,“民之困悴,殆罄罄无告矣”^[5]卷17,与四川宣抚王枢密札子。提供军粮是汉中民众的沉重负担,往往名曰和余,而实同苛敛,“边民苦和余,实不得一钱,吏且督输旁午,汉中尤以为病”^[6]卷99,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黄裳有《汉中行》一诗为证:

屯军十万如貔貅,椎牛酹酒不得饱。飞鸟挽粟无时休,禾稼登场虽满眼,十有八九归徵

汉中盆地是蜀道经济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收稿日期:2007-03-20

作者简介:何玉红(1977-),男,甘肃民勤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宋史。

求。军前输米更和余，囊括颗粒无乾餽。棱棱杀气森平原，虽食我肉不敢言。阵马如云动雷电，戈戟纵横撞相腾喧。口边夺食与马齿，马饱人饥无处说。大吏明知但吁叹，百姓俯首当获窃。天高日薄炊烟冷，村落萧条往来绝。^[7]黄裳《汉中行》，173

可见，川陕驻军人数多，供给困难，官府诛求无已，致使民生凋敝，生活无望。南宋吴泳也有一首《汉中行》，比较了南宋之前与南宋时期汉中的社会变化。南宋以前的情况是：

汉中在昔称梁州，墜腴壤沃人烟稠。稻畦连陂翠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年年二月春风尾，户户浇花压醪子。长裙阔袖低盖头，首饰金翘竞奢侈。

南宋之前，汉中人口稠密，农业繁盛，民众生活闲适，宽绰有余。时至南宋，情况为之一变：

自从铁骑落武休，胜事扫迹随江流。道傍人荒鸟灭没，独有梨花伴寒食。君不见，当年劫火然，携老扶幼奔南山。又不见，拗项桥边事，七八千兵同日死。死则义魄犹有归，存则偷生漫如此。三人共，一椀灯，通夜纺绩衣鬻髻。八口同，半间屋，煮糲椎水常不足。家粮一石五券钱，一半入口一半官。男担军装出边去，女荷畚鍤填壕还。^[8]卷2，汉中行

显而易见，南宋与南宋以前的汉中形成鲜明的对照，民众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人口稀少，供军负担沉重，生计无望。

北宋时期，汉中盆地商业繁荣^[1]。南宋之时，汉中商业萧条。宋金以秦岭为界，秦岭以北被金人占有，北宋时期来往与秦岭南北的商业贸易完全停止。宋金和议达成，也只在秦州设有一处榷场。榷场交易，官府对商品的限制非常严格，而且一旦宋金战争发生，榷场关闭。因此南宋汉中的商业贸易根本无法与北宋相比。民众只得通过走私获得生活必需之物，而这又因宋金和议的条款规定以及处于边防安全的考虑，遭到南宋政府坚决打击。如对“沿边人盗贩解盐，私入川界，侵射盐利”之事，在沿边地带“广布耳目，严行缉捕”^[9]卷26下，淳熙七年八月己丑。淳熙十年（1183）九月癸未，吴挺上言：“本司同安抚司增置赏钱，募人告捉盗贩解盐入界，见系出戍官兵把截去处，严行搜捕，外有不系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沿边州郡，督责捕盗官司搜捕。”中央下诏，在阶、成、西和、凤州严格执行，毋得透漏，“如未觉察，守令并取旨，重作施行”^[9]卷27上，淳熙十年九月癸未。在严密的稽查之下，民间贸易很难进行。再如孝宗时，周嗣武“为夔路漕，建言蜀号天险，舍剑门无他道。近岁文州辄开青唐岭，利州辄开马道院，皆不由剑阁，别架栈道，以引商贩，冀收其算，宜杜边境萌隙，悉奏

撤之，俱从请”^[10]卷184《利州》，5358。为加强边疆防御，有意破坏商业贸易得以依赖的交通路线，致使商业活动根本无法开展，也只会有一些边界之民，“多以贩解盐为生，啸聚边境”^[11]甲集卷18，利路义士（忠义人），408。正常的商业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南宋汉中驻军数量大，军费消耗多，增印钱引是供给军队的重要途径。由于军费开支浩大，故钱引往往超过每界限额发行，前一界钱引未到界满，又增印新引，最终导致钱引贬值，物价上涨，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遭到破坏。在一些地方出现“一引之直，仅售百钱”之事，以致“商贾不行，民皆嗟怨”^[12]卷181，食货下三·会子，4410，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商业流通得以依赖的货币体制遭到破坏，商业贸易何从谈起。显然，从以上论述来看，南宋时期汉中盆地农业衰落，商业停滞。

二

以上从汉中盆地整体情况分析了战争与供军对社会的影响。下面再从汉中盆地各州在两宋时期的比较中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洋州是蜀道城市带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洋州在北宋时农业就很发达，“在蜀最称善地，所乐有江山之胜，其养得鱼稻之饶”^[13]卷28，洋州谢到任表。北宋洋州的商业也很知名，“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产，济人急用之助，品目甚众，旦夕羸辇，道路不绝，间巷井邑，百货填委，实四方商贾贸易毕至之地”。由于洋州与巴、达、金、凤等处相连，在子午、骆谷交通要道，“私商暗旅，出入如织”^[13]卷34，奏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状。北宋的洋州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业贸易活跃，民生殷富。

与北宋的繁盛景象相比，南宋洋州的经济走向衰落。史载：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丙戌，臣僚上言指出，“梁、洋沃壤数百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由于战争影响，“两州之民，往往逃趋蜀中，未敢复业，垦辟既少，多屯兵则粮不足以贍众，少屯兵则势不足以拒敌”^[2]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丙戌。洋州虽然土地肥沃，无奈人口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以致不能满足当地驻军的军粮需求，直接危及边防安全。除战争破坏与人口流失外，供给军队钱粮、赋役繁重对洋州经济发展影响犹大。茶税收入是川陕军费的重要来源，为获取较多利润，官更多方苛求。史载，洋州西乡县产茶，“亘陵谷八百余里，山穷险，赋不尽括。使者韩球将增赋以市宠，园户避苛敛转徙，饥谨相藉”^[12]卷388，唐文若传，11911。因官府苛求，洋州茶业遭到破坏。洋州的农业也因供给军队受到影响。因战争影响，洋州民户一度逃离田地，战后“逋户反业，得贷牛出租于官，合诸州累欠至三千余硕，总计者用为实数以给军，边民至破产不能偿”。由于供军紧急，返回田间的民众再遭苛敛。“郡岁受民租，总赋者辄对余以给军。先时民输一

石以七合为羨，其后并缘十倍之，至是又欲以七升为额。”反映了对余军粮对民众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史载，在兴、洋之间，“多营田，与民田错，官军怙强为扰，田且多荒”^[14]卷39，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军队强占侵扰，导致田土荒芜。

兴元府是蜀道城市带上的另一重要城市。北宋时期的兴元府，“川陆宽平，鱼稻丰美”^[13]卷28，谢翱差知兴元府表。由于经济繁荣，民众安居乐业，“邑屋富盛，人民繁庶”^[13]卷34，奏为乞置兴元府府学教授状。兴元府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商业贸易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从自然资源看，“平陆延袤，凡数百里。壤土演沃，堰埭棋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从交通与商贸看，“远通樊、邓，旁接秦、陇，贸迁有无者，望利而入”。社会的全面繁荣使兴元府成为四方人士向往之地，“四方来者，颇自占业，殊习异尚，杂处闾里，天下物货，种列于市……公余私贩，辇负不绝”。兴元府城中民众的日常生活，尤值得称道，“一城之中，民屋错比，连甍接宇，可数万计，生齿杂沓，填斥坊闾”^[13]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城及添兵状。

与北宋的繁盛相比，南宋兴元府社会经济退步很大。史载，绍兴三年（1133），知兴元府刘子羽迫于金人进攻，一度“焚兴元，退守三泉县”，当时“从兵不满三百，与士卒取草牙、木甲食之”^[12]卷370，刘子羽传，11507。兴元府焚烧之后，尚不能提供三百人的食粮，经济衰败由此可见。战争对兴元府民众生活的破坏极为严重，“兴元自兵乱以来，城内生荆棘，官民皆茅屋，而帑藏寓僧舍”^[2]卷164，绍兴二十三年五月庚子。这一景象与北宋兴元府“民屋错比”的富庶有天壤之别。史载：

兴元府比年以来，多以大将知府，往往文法阔略，官吏自恣，一府四县田产，十分之六归于大将之家。又有依托其名以侵渔细民，避免赋役者。每年总领所与本府和余军粮一色不下三十余万石，止取办于编户，科敛偏重，民益困敝。^[15]汪应辰《乞差文臣知兴元府札》，99

武将知州，疏于民事，私占田土，民众生产与生活受到影响。在边防驻军的粮饷供给中，兴元府等地负担尤重，“民间所余家业不多，科买军粮草料，苦于偏重”^[2]卷180，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时至南宋晚期，“山川寂寞非常态，市井萧条似破村。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饿死弃儿孙”^[16]卷1，兴元府，140。兴元府一片狼藉，破败不堪。

金州也是蜀道城市带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我们再比较这一城市在两宋时期的变化。在北宋中期，金州“政平岁丰，士民康乐”^[17]卷12，忘归亭记。经济与社会发展非常不错。南宋的金州却呈现出衰败的景象。战争对金州的破坏非常严重。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人攻陷金州，王彦认为“敌所以疾驰者，欲因吾粮食以入蜀耳，即尽焚储积”，金人无粮

可食，随之退师”^[2]卷62，绍兴三年正月乙丑。绍兴初年，郭浩知金州，由于战争影响，“金州残弊特甚，户口无几”。之后通过招集流民，生产才得以进行^[12]卷367，郭浩传，11442。战争直接造成金州人口的锐减。绍兴末年虞允文为四川宣谕使，其所见金州统兵武将，巧取豪夺民财，肆无忌惮，“辄以十数万计，贪墨自肆，上下一律，略无忌惮，至军民日用食饮之物，一毫不恤也”^[18]卷214，虞允文《论金州之弊乞加威令于诸将状》，以营利为先，甚至“将朝廷降到招军银并度牒，以和余为名，公然盗取，民间和余本钱，多以茶盐布等折支”^[18]卷240，虞允文《论去蜀中二弊疏》。军队诸多腐败现象发生，对粮饷钱物诛求无已，民众生产与生活遭受极大的影响。史载，吴曦叛变平定后，宣抚副使安丙欲对土地进行全面经量。当时金州守臣宋子钦上言：“此州疮痍甫瘳，边民恐不可尽其利，官一入境，将散而之四方矣。”最后在土地经量中，将金州排除在外^[11]乙集卷16，关外经量，796。若非金州过度残破，并不能免除此次经量。显然，金州的衰败已经到了官府无法征敛的地步。南宋诗人眼中的金州，也是空旷寂寞之态，“寥寥空馆风号木，浩浩长云雪过窗”^[19]卷10，金州行衙。

蜀道城市带上的另一重要城市利州在南宋也走向衰落。北宋时，利州之民“山居而谷饮，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20]卷29，安宗说知利州。南宋员兴宗记载利州的情况称，“奔驰蜀道三千远，控制秦关百二强。况是太平今有象，边城处处乐耕桑”^[21]卷3，与利州守。员兴宗乃绍兴、乾道年间人，员兴宗所称，当是这一时期利州的景况，农业生产看来不错。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变，利州也受影响，“州自乱后，气象荒索”^[22]卷75，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时至南宋晚期，利州的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利州的发展在时人眼中已经残破不堪，所谓“城因兵破慳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16]卷1，利州，140。利州的衰败，既有战火的影响，南宋苛敛无已也是原因之一，过去的繁荣景象已是过眼云烟。

兴州在两宋时期的变化也反映出蜀道经济带的衰落。北宋时期，“山绕兴州万叠青，池开近郭百泉并。昔年种柳人安在？累岁开花藕自生。波暖跳鱼闻乐喜，人来野鸭望船鸣”^[20]卷2，兴州新开吉东池。兴州山青水秀，万象生荣，民众安居乐业。南宋时期，兴州是川陕战区屯驻军队最多的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供给军队的任务非常繁重。开禧三年（1207），吴曦据兴州叛乱，兴州遭到很大的破坏。兴州在南宋的社会景况，有诗为证，“非干秋色苦，客意自萧条”^[19]卷6，兴州道中遇雨。兴州已经失去了北宋时的兴旺景象。

从北宋与南宋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南宋时期洋

州、兴元府、金州、利州、兴州各州的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等与北宋的盛况相去甚远，各州的社会经济呈现出衰落的景象。

三

阶州、成州、西和州、凤州、秦州等关外诸州是蜀道经济带的组成部分。南宋关外诸州地处边防前沿，战争与供军对当地的影响最大，社会经济发展日趋下滑。其中供给军队物资，成为关外诸州民众的沉重负担，这直接制约着关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史载，“关外阶、成、西和、凤四州，岁苦和余。而凤州在鱼关前百九十里，系嘉陵江源，滩石水涩。阶、成、西和去江愈远，无由漕运，和余莫免”^{[23]卷67, 读文集九·范石湖文}。凤州虽处在嘉陵江源，但江源地带水浅无法运粮，转运粮饷成为当地民众的负担；阶、成、西和三州却远离江流，陆路转运军粮不可避免，所谓“沿边数州之民，又苦差使繁重”^{[18]卷169, 赵汝愚《论荐劾西蜀诸守令奏》}。文州也因转运粮草民不聊生，所谓“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6]卷91《文华阁待制杨公行状》}。

南宋关外诸州战略地位重要，驻军粮食消耗量大，为此南宋在关外施行屯田。从整体发展趋势看，关外等地屯田收入逐步减少。在绍兴十五年（1145），阶、成、西和、天水、沔、凤、梁、洋、利九郡营田，共垦田二千六百五十余顷，收入共计一十四万一千零四十九石。到淳熙、绍熙间，田亩虽增至七千七百零五顷，而所收只有九万八千六百五十余石。时至嘉定年间，收入还不足四五万石^{[24]《食货》63之158}。关外屯田的衰败，同样反映出蜀道经济带的衰落。究其原因，经营中管理混乱与战争破坏是重中之重。绍兴十五年（1145），关外四州及兴州、大安军开垦营田有二千六百十二顷，收入十四万一千四十九石。乾道以后，“强将、豪民利于承佃，故为欠输，得不偿费”，军民杂处，侵渔百端，在执行中，“水旱则令保甲均认租数，民甚苦之。兼所收之租，不偿请给之数”^{[11]《甲集》卷16, 关外营田, 350}。强制性经营，效率必然不佳。淳熙五年（1178）闰六月六日，吴挺言，阶、成、西和、凤州并长举县营田，以淳熙三年计之，所得才四万九千余缗，而所费乃一十四万余缗^{[24]《食货》63之154}。关外营田投入高达十四万之多，而收入不足五万。营田之衰落，于此可见。战争破坏也是影响屯田效果的重要原因。关外诸州，接近边界，由于战事不断，“兵火之余，田莱多荒”^{[6]卷99, 端明殿学士致仕赠资政殿学士黄公墓志铭}。诸州屯田，“大率昔为膏腴，今成荒弃”；“原堡多隳，地利悉弃”^{[22]卷16, 奏论蜀边垦田事}，战争破坏相当严重。绍兴十六年（1146），知西和州程俊上奏西和战后的情况：“本州并边多沃壤，而耕凿或无其人，疲瘵之民，无力复业。”^{[2]卷155, 绍兴十六年正月丙申}嘉定年间，制置使董居谊、郑

损丧弃关外五州，“并边膏腴之地，人莫敢耕”^{[22]卷19, 被召除礼部尚书内引奏事第四札}。理宗时，李鸣复讲述其在西和犒军的所见，“见其人品强劲，技艺骁勇，问其所管，仅一千四百余人。此大郡也，而其数止此，阶、成、凤可知也”。究其原因，关外之地民众供军负担沉重，不堪其劳，逃离四方^{[18]卷99, 李鸣复《论措置蜀事疏》}。人口外流，土地荒废，关外诸州农业生产与经济发展便无从谈起。

战争直接导致关外民众丧家破产，更是常事。开禧三年（1207），吴曦叛变，金兵入侵，“肆掠关外四州，如践虚邑，军民莫知死所”。叛变虽然平定，但“四州兵后，民不聊生”^{[12]卷402, 安丙传, 12188—12191}。嘉定年间，金人入侵天水、成州、西和，“公私所藏，其陷没者不知其几千万”^{[25]卷7, 上本路运使论夫钱札子}。理宗后，蒙军入侵，“掠成破凤，歼沔毁梁，金、洋、阶、文悉为躏藉，剑以外，骸骨相枕，剑以内，室家靡宁，居者荷担而立，仕者浮家而下”^{[18]卷100, 吴昌裔《论蜀变四事状》}。战争的影响已经延及内地。关外之地丧失后，更是一片惨象，有诗为证，“蜀自开禧后，西垂畏廩秋。更经两单阕，尽弃五边州”^{[22]卷92, 高龙学}。战争之后，时人所见一片凄凉的景象，所谓，“败屋翳蒿径，颓墙荒棘丛。稻田多宿莽，麦陇间铺茸”^{[26]卷11, 行黑水谷三十里以耳目闻见有感}。战后关外诸州房屋破坏，田土废弃，毫无生机。

我们比较一下秦州在北宋与南宋时期的情况。秦州在北宋时，经济繁荣，“号为富庶”^{[27]卷49, 咸平四年十月庚戌, 1078}。秦州商业非常兴盛，“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24]《食货》37之14}。北宋时期秦州的农业也很发达，史载：仁宗天圣年间，薛奎在秦州，“教民水种……而秦之余粟积者三百万，征算之衍者三十万，核民旧隐田数百顷，所得刍粟又十余万”^{[28]卷26, 薛奎墓志铭}。秦州物产丰富，囤积余粮非常可观。南宋之时，受战争等影响，秦州社会经济发展急转直下。南宋初年陕西五路失陷之前，秦、凤等地与汉中一带，“负贩往来，山谷险绝，皆成蹊径”^{[29]卷1, 论西幸事宜状}。秦州与汉中的贸易尚且不错。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南宋与金以秦州为界，南宋在境内设置天水县。据载，“天水，国郡也，山环合而集，水交流而清，风淳俗厚，自凉抵秦，凡邑无出其右者”。但天水地处边界，直接与金朝接壤，是金兵南下首先经过之处，也最先遭到破坏，事实正是这样。兵火之后，“通道邻壤，更戎马躏践，虽欲经理，非特不暇，而力且不给”^{[30]卷4, 天水县三清阁碑}。要想恢复往日的生产与生活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开禧、嘉定年间，天水经过吴曦叛变的影响以及金人的骚扰，“民自离兵戈，有田者亦弃去”^{[22]卷75, 知文州主管华州云台观安君墓志铭}。为躲避战争，民众抛弃田土。宋金以秦州为界，在此地长期对峙，直接

导致整个秦州一带经济的衰败，“距秦州数十里外，皆平川，所谓秦原也是也。承平时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会，邑屋甚壮。既陷敌之久，余民居止什一”^[21]卷24，西陲笔略。秦州人口大量减少，原来的升平气象为之一变。不难看出，以秦州为代表的关外诸州在战争破坏和物资供应的影响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同样趋于衰落。

四

成都在北宋时期是蜀道城市带上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梓州也是经济实力较强的繁华都市^[1]。从南宋尤其是南宋晚期的情况看，成都等地的经济发展也走向衰落。南宋蜀道经济带上的汉中盆地与关外诸州由于地处战争前沿，受到战争以及供给军队的影响较大。此外，直接受到战争和供军影响的还有四川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和夔州路。南宋时期，这些地区始终承担着为川陕驻军提供粮饷物资的重任，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至于川陕防线被蒙军突破后，这些地区就直接遭到蒙军铁骑的侵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南宋时期整个四川地区赋税沉重，主要源于供应川陕驻军。时人直接指明这一点：“张浚既失五路，力不足以养兵，乃以五路财赋均之西蜀，增立名色，谓之折估，蜀人由是重困。”^[31]卷1，论蜀札子一。从富平之败后川陕驻军以来，四川民众就担负起不断向军队提供粮米、布帛、草料、钱银等的重任。绍兴六年（1136）三月，四川制置大使指出，“四川赡军十年，民力困弊”^[2]卷99，绍兴六年三月壬辰。四川除成都府路经济比较发达外，其他地方并不富裕，加之供军，负担更重。事实上，即使是成都府路民众，也为供军殚精竭虑。史载，“成都一路，素号繁华，缘自军兴以来，困于支移折变，日朘月削，寢不可支”^[18]卷169，赵汝愚《论荐劾西蜀诸守令奏》。为解决军费，四川增设诸多赋税名目，诸如对余之米、激赏之绢、募兵赡家之钱，“比昔时之税，不知几倍”。茶、盐、酒法改革后，“官收九分之息，下无毫末之利”^[22]卷128，绍兴九年五月癸卯。赋税名目增多，在征收中额外增加又多。时人指出，“蜀自绍兴末年以來，一尘不警，百姓岁输赡军，近二千万缗”。平时供军，数量如此之多，一旦军兴，用度繁兴，“内郡廩庾，取之无镗粒之积；调夫繁伙，倍于常赋；激赏畸零，既减又复”^[22]卷82，秘教书丞兵部郎官潼川府路转运判官张公巽志铭。“蜀宿重兵，岁月淹久，一岁供亿无虑千万缗，玉垒丰腴，燥于转输，西海羽毛，烬于器甲，而蜀人之力日以殫矣。”^[18]卷91，喻汝砺《裕蜀策》。在沉重的赋税负担之下，民众生产和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

税多赋重之外，供军中的官吏舞弊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影响亦不小。由于供军，“川陕宣司随军漕臣与总司官属，贪应办之赏，矜措置之能，悉将祖宗

两税，旧法折科，辄肆改易，反复纽折，取数务多，折科一改，遂为永例，弃业逃移，由兹而致”^[2]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戊申。供给军队粮饷数量大，转运之中，弊端丛生。“四川军兴以来，供亿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2]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乙未。在军粮转运中，由于屯兵之地与余买之地相去遥远，“屯师兴、利，而乃取粮西川，水陆漕运，是民力未有息肩之期也”^[2]卷118，绍兴八年三月甲辰。在水、陆两线，民众为转运粮物常年奔波。

金、蒙势力突破川陕防线后，四川直接面临战争的破坏。“北人刈我边陲，突我堂奥，兴、沔、利、阆、绵、剑、潼、遂、彭、汉、成都、嘉、眉莽为盗区。”^[8]卷20，论环蜀四证及救蜀五策札子。整个四川地区，“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18]卷100，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南宋后期，在宋蒙大规模的战争中，四川“土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32]卷1，上宣谕论推轂书。时人甚至称，蒙军入侵四川，“西川之人十丧七八”^[18]卷100，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据学者研究，南宋晚期，在战争的影响下，包括战乱死亡和逃散迁徙等，四川人口减少幅度非常大。嘉定十六年（1223）四川有259万户，到元朝至元十九年（1282）只剩下12万户，也就是说在六十年间，四川的户口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247万户减少。南宋末年四川人口锐减，使四川户口在全国户口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两宋时期，四川的户数约占全国户数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到了元代只占百分之零点七了。从四川的人口密度看，也由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平均每平方公里27.2人，降到元代的2.17人。再从成都府路的人口看，在宋蒙战争中，成都府路人口大量减少，由嘉定十六年的1139790户，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只剩32912户，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七以上^[33]625。在古代农业社会，人口数量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整个四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正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衰败景象。理宗时，李鸣复指出，“今蜀困甚矣”，“蜀自开禧丁卯以来，屡经大变”，先经吴曦叛变破坏，再经金兵侵扰，之后的蒙军入侵危害更大，“而蜀之为蜀，大非昔比”^[34]卷80，李鸣复《策全蜀安危疏》。以上只是战争与供应军队对四川人口减少以及对民众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影响。随着川陕防线被突破，蒙军进入四川，导致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其中包括许多知名的学者。学者向外地迁移，使一度兴盛的宋代蜀学出现转移与衰落^[35]。战争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生产和生活的破坏，一直深入到学术领域。不难看出，南宋时期，不管是供给军队的影响，还是战争的直接破坏，整个四川人口锐减，民众负担沉重，经济发展日趋衰落。与此相联系的蜀道经济带的发展，不再呈现出北宋时期的繁荣景象，经济和社会发展日益萧条。

五

从上可见,南宋时期,蜀道经济带一度繁荣的城市,如洋州、兴元府、金州、利州、兴州、秦州、成都府等,逐渐失去其往日的繁华,蜀道经济带一度发达的农业与繁忙的商业贸易,日趋萎缩,整个蜀道经济带呈现出衰败的景象。南宋成为蜀道经济带由繁荣走向衰落的风水岭。众所周知,南宋建都临安,偏安一隅,处在上游的四川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川陕军民的抗战,为确保南宋东南安全功不可没。但川陕边防的巩固,是建立在蜀道经济带经济支撑和当地民众巨大付出的基础之上的。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宋蜀道经济带衰落过程中,战争直接破坏与军队物资供应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原因。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案例。战争破坏与供给军队对南宋蜀道经济带衰落的影响,也是我们认识历史时期蜀道经济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

参考文献:

- [1] 梁中效.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95-100.
- [2] (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 [3] (宋)蔡戡. 定斋集[M]. 丛书集成续编本.
- [4] (宋)杜范. 清献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5] (宋)薛季宣. 浪语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 (宋)楼钥. 攻媿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7] 许吟雪,许孟青编著. 宋代蜀诗辑存[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
- [8] (宋)吴泳. 鹤林集[M].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 [9] (元)不著撰人. 宋史全文[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 舆地纪胜[M]. 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2005.

- [11]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2] (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3] (宋)文同. 丹渊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14] (宋)张栻. 南轩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5] 栾贵明辑. 四库辑本别集拾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 (宋)汪元量撰,孔凡礼辑校. 增订湖山类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7] (宋)陈师道. 后山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8] (明)黄淮、杨士奇编. 历代名臣奏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9] (宋)张嶠. 紫微集[M]. 丛书集成续编本.
- [20] (宋)苏辙. 栾城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21] (宋)员兴宗. 九华集[M].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 [22] (宋)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23] (宋)黄震. 黄氏日抄[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4]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25] (宋)度正. 性善堂稿[M].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 [26] (宋)程公许. 沧洲尘缶编[M].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 [27]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8] (宋)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居士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宋)赵鼎. 忠正德文集[M]. 乾坤正气集本.
- [30] (清)张维. 陇右金石录[M]. 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
- [31] (宋)袁燮. 絜斋集[M]. 丛书集成新编本.
- [32] (宋)阳昉. 字溪集[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3] 贾大泉. 宋代四川经济述论[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34] 傅增湘纂辑. 宋代蜀文辑存[M]. 香港:龙门书店,1971.
- [35] 胡昭曦. 宋代蜀学的转移与衰落[M]//胡昭曦. 胡昭曦宋史论集.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A Study on the Decline of Economic Belt Along Shu Road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E Yu-ho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hu Road economic belt was an important economic developmental region in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re were a lot of wars and long-term resist between the Southern Song government and Jin and Meng minorities. The Shu Road economic belt became frontier defense and very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where the army had garrisoned for a long time.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of people had been destroyed by the war and the materials supply, and this resulted in the decline of Shu Road economic belt. The decline of Shu Road economic belt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a typical case 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r, the materials supply,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hu road; decline; material supply; damage caused by battle